

ISSN 0257 - 5833

CN 31 - 1112/Z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二〇二六年第四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总第548期

1979年创刊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04

Apr 2026

社会科学

SHEHUI KEXUE

2026年第4期 | 总第548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权衡

副主任 干春晖

院内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健 刘芸 刘炜 李骏 吴雪明 沈开艳 沈桂龙 周冯琦
侯永刚 姜佑福 姚建龙 袁筱一 黄凯锋 盛垒

院外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宁 王轶 王新生 毛丹 文军 文贵良 艾四林 冯果
冯贤亮 仰海峰 刘元春 刘成纪 刘守英 安介生 孙向晨 苏长和
李友东 李迎生 杨雪冬 吴向东 何志鹏 佟德志 邹诗鹏 汪涌豪
沈岩 张军 张越 张凤阳 张永清 张志强 郁振华 周飞舟
周光权 庞立生 胡大平 贺雪峰 黄先海 黄纯艳 彭诚信 韩建业
程相占 解超 燕继荣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目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5	城市文化气质提升的多维路径与限制突破	田毅鹏

	方法、体系与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	
17	论“逻辑分歧”：何以可能与如何理解	张留华

	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强国	
29	出口退税政策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	
	——基于供应链韧性的分析	杨连星 王秋硕
43	教育投资能够提高工资薪酬吗？	
	——基于企业招聘数据的证据	何东伟

	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	
57	论政府治理体系中的连廊构造：对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理论研究	李瑞昌 徐振炀
69	界面升维与基层治理张力消解：以H街道实践为例	任勇 周泉
82	服务购买制度情境下社会组织为何主动去专业化？	吴同

哲学之思与时代之问

- 97 《生产之镜》：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错位批评 仰海峰
107 “当理”而“无私心”：罗钦顺实学伦理的二重维度 金香花 王竹音

·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研究 ·

- 117 晚清官立学堂体制的建构、运作及其改革 蒋宝麟
132 清代边疆商民的协作网络与基层治理
——以天山南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柳岳武 张文桦

· “五四”文学遗产的接受与再生产 ·

- 145 新旧易位：“五四”后文学革命的重整与再造 姜荣刚
157 重复与差异：论鲁迅《伤逝》在“南方”的“重写” 刘亚群

· 组织体法治 ·

- 167 特别公司示范章程的功能延展 龚浩川
179 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张伟
-

·“五四”文学遗产的接受与再生产·

新旧易位：“五四”后文学革命的重整与再造^{*}

姜荣刚

摘要：“五四”文学革命始初确定了“全盘西化”的文学革新目标，因而对传统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但未及两年，西方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自身文化反思所导致的“向东望”的文化趋向——赞美与学习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流中国，促成了中西新旧的易位。这不仅重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形象，促成了传统文学的复兴，也催生了学衡派、甲寅派、国家主义文学等诸多自认为新潮或堪称“文学革命”异调的文学变革趋向。在此种情势下，文学革命派及其继承者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不得不对原有文学革命思路予以重整与再造，以应对反对派的挑战与适应新的现实需要。还原这一历史过程，无论是对于全面反思“五四”文学革命与其他文学变革趋向的成败得失，还是对于今天的文学创新乃至文化重建来说，均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新旧易位；中西融合；文学革命；异调；再造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26) 04-0145-12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6.04.014

作者简介：姜荣刚，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

近现代的中国，诚如罗志田所说，已失去重心，“思想界和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其直接后果就是要“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否则就会落伍”。^①一般而言，“新”的判断标准，大体而言是西学为新，中学为旧，趋时为新，过时为旧。因此在近现代的文学发展史上，谁占据了“新”的制高点，谁就具有了话语的优势，也就容易成为文学潮流的引领者与主导者。“五四”文学革命倡导“全盘西化”的文学革新主张，尽管观点极端，且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但仍缺乏旧派人士的有力抵抗，其因即在于此，因而只能自导自演一出“双簧戏”，以求其学说能得到时人注意，产生宣传效应。不过，文学革命发生之初尽管风光无两，但未及两年便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对此学界虽然有很深入的探讨，但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此时的新旧^②已发生了易位，文学革命不得不进行重整与再造，这即是其衰退的本质或者说关键原因。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因此引起了西方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的力度是空前的，并由此出现了“向东望”的文化趋向——赞美与学习东方文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群体文献辑考、整理与研究（1840—1927）”（项目编号：22&ZD2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粹思潮与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1BZW026）的阶段性成果。

^①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30、87页。

^② 本文所说的“新”“旧”是相对而言的，并且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对历史现象或当事人话语的一种客观描述，不具有是非判断与褒贬色彩。同时，“新”“旧”与中西的对应也是部分而非整体性的，不可拘泥理解。此外，本文尽管从“新”“旧”这一新的角度切入讨论问题，并非认为其为唯一或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因论题与篇幅所限无法旁及，不存在否定或排斥其他因素存在的意图。

化（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留学德国的宗白华，就说德国大战后文化批评的书籍风行一时，特别流行的两部著作《西方文化的消极观》《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①正如罗志田所说，“五四”以前中国士人多视西方为一个整体，“那时所有西来的‘主义’，基本上都被看做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且都是这个特定的更新更美好的整体的一部分”。^②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人可谓亲手摧毁了中国士人的这种迷梦，同时也重塑了东方文化的正面形象，促成了中西新旧的易位。宗白华称这种中西方相互学习的文化现象为“东西对流”，可谓精准地把握住了“五四”后文学生态的崭新变化。宗氏同时还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的文学生态对国人文化观念重塑的深刻影响，他说，“有许多中国人，到欧美后，反而‘顽固’了”，并称自己“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③宗氏特意在“顽固”一词上加了引号，是颇有意味的，这一“顽固”来自西方，而且是西方“更新更美好”的那一部分。很显然，宗氏的“顽固”是反用其意，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倡导“全盘西化”的文学革命者反倒成了“顽固”也即旧的一方。由此可见，“五四”以后文学革命的迅速衰退或者说重整与再造，以及反对派的纷纷出现，很大程度上可能正像宗白华一样，是在中西新旧易位这一新的文学生态下对文学革命的重整与再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顽固或复古。因此，从新旧易位这一新的视角而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其后文学变革的种种趋向与自身调整，或许才能看到一幅与历史真实更为接近的图景。

一、新旧易位与传统文学的复兴

“五四”文学革命的目标是“全盘西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破除传统文化的羁绊与影响，陈独秀说得很清楚：“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④因此在“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之初，传统遭到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恰在此种风潮如火如荼进行之际，西方基于“一战”的文化反思，开始进入国人视野，中西新旧的易位使得被压抑的传统得到解放与复兴，从而间接地影响了其后文学变革的整体生态及其发展趋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甫一爆发，中国本土士人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因此早期关注并着意研究者不乏其人。不过，由于此时国内因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复古事件的刺激，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正处于蓄势待发期，因此对西方文化反思的引介并未引起学界的特别注意。真正使西方文化反思在国内掀起巨浪的是1920年梁启超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梁氏不仅一直关注研究“一战”，且在大战结束后不久也即1918年底便率队赴欧洲访问考察，经过一年有余的辛苦调查，最终撰成《欧游心影录》。该书以对比的方式揭示了大战后欧洲从物质到文化的全方位巨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万能梦的破产，并称这是西方“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⑤导致西方思想界进入了“混沌过渡时代”，人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觉之士已开始“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图个东西调和”。^⑥这种“向东望”的文化趋向，无形中抬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而使“五四”文学革命对传统的否定与批判完全失去了效力，从而重塑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所以梁氏说此次欧洲考察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将对中国文化悲观的情绪一扫而空，认为未来国人应“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使“消极变为积极”。^⑦由于梁氏在言论界领袖群伦的地位，其观点很快风行开来，影响至巨。胡适即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

① 《宗白华自德见寄书》，《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2月11日。

② 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③ 《宗白华自德见寄书》，《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2月11日。

④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⑤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3，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页。

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3，第27页。

⑦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3—214页。

学’”，而至梁氏《欧游心影录》发表，“科学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①破除了“科学”这一西方物质文明代表的神话，自然就为以精神文明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道路，促成了中西新旧的易位，这正是胡适对该书极为不满的关键原因。

梁启超游欧归国除出版《欧游心影录》外，还发起成立了“讲学社”，拟每年邀请一位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以输入西方最新思潮，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梁氏原拟邀请在西方以反省物质文明著称的哲学家柏格森、倭铿来华讲学，但二人因故未能成行。第一位应邀来华的是杜威，杜威在中国巡回讲学一年，其观点尽管没有欧洲学者亲身经历大战，对物质科学所造成灾难的切肤之痛，批判不如后者激烈，但也明确指出“东方所得的西洋文化，好处不如坏处，益处不如害处”，同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长处。^②1919年底，蔡元培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宴的演说词中说杜威的学说与孔子很有相同之处，并称这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③通过蔡氏的评价可以看出，杜威的思想与欧洲大战后文化反思的取向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第二位应邀来华讲学的是罗素，他在来华前即对西方物质文明尤其是资本制度所产生的恶现象极为厌恶，而崇拜中国文化，亲历中国后，中国文化更使他倾心，认为中国文化胜过西方“碾碎一切的大机器文化”，也比西方文化“更能使人类快乐”。^④因此他对时下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建议是对西方文明的输入要扬善弃恶，同时还要结合自身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取得辉煌成就，并警告这一过程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全盘西化与盲目排外。^⑤除欧美学者外，讲学社还邀请了深受欧美学者认可的印度学者兼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本属东方文化圈中人，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及对东方文化的赞美更有甚于欧美学者。他自称来华的目的就是“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同时借欧战批评泰西文化“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⑥由于泰戈尔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致，因此他在中国的演讲反响更为热烈，当然也引起了拥护科学与反传统者特别是新青年派的警觉与批判。

与梁启超出版《欧游心影录》及邀请域外学者来华讲学的同时，还有大量的留学生，也同样在做着西方“向东望”文化趋向的反流工作，因而影响更为巨大。前文所举宗白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不仅欧美留学生，即使是受间接影响的日本，留学生也同样受到此种文化反流的深刻影响。周海林注意到同期由留日学生组织的创造社，与国内新青年派激烈的反孔思想不同，他们对孔子不但没有批判，“反而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歌颂孔子功绩的文章”。^⑦周氏认为这是留日学生受日本歧视中国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回应与抗议。这一看法虽不无道理，但却忽略了西方文化反流的影响，后者恐怕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1923年，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称“德国人对于我国文化近来仍是十分关心，这真足以使我们增加无限的自觉与自信”，这说明郭氏对西方“向东望”的文化趋向十分了解，不过他并不赞同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过分宣扬科学文明破产的观点，而认为要救当下中国，既要唤醒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还必须“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⑧这一思想基础正是创造社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新青年派有所差异的关键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受“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留学生中盛行国家主义思想，并自发形成了大量社团组织，其著者如少年中国学会、大江会、孤军社等。这些社团组织基本都具有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认为欲救亡图存，必须首先保存与发扬祖国文化。如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王光祈就明确指出少年中国运动目的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首先便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⑨为配合宣传社团宗旨，这些社团组织不少有自己的机关报，如少年中国学会的《醒狮》、大江会的《大江季刊》

①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亚东图书馆编：《科学与人生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页。

② 王凤玉、单中惠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4年，第55页。

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0页。

④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

⑤ 罗素：《中国问题》，第5页。

⑥ 《太戈尔之来华感想谈》，《申报》1924年4月14日。

⑦ 周海林：《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于早期成员的研究》，周海屏、胡小波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⑧ 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创造周报》第5期，1923年6月10日。

⑨ 《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63页。

等，从而更加扩大了其影响面。

与“五四”以前肯定传统文化而倡导保存为主不同，此次因西学反流使得传统文化参与新文化建设的价值得到了凸显，从而吸引了大批新旧学者参与到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来。如梁启超，他认为传统文化要想发挥其有益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作用，就需要进行一番整顿发扬的功夫。^①所以他游欧归国后，除发表《欧游心影录》及组织讲学社外，便迅速投入到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中去。类似梁氏这样由“新”而“旧”或思想倾向于“旧”的学者甚多，从而产出了大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出版即引起了文化界的轰动，在此后的十年间先后印刷十余次，而且还由此引发了新旧两派关于东西文化优劣的大讨论。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及其追随者也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不过其目的与前述所谓旧派的传统文化研究不同，他们试图通过还原传统的本来面目，以消除笼罩于其上的神圣光环——也即“打鬼”，从而破除传统的束缚与阻碍，以配合新文化运动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趋新派的“整理国故”运动尽管遭到极端守旧派的反对与批评，但却获得了旧派中开明人士的认可与拥护。胡适的国学研究就深受梁启超的推崇。朱谦之甚至说：“今之言新者，于修明古学，固当急之务矣……吾尝察今兹新思想之由来，吾不能不推绩溪胡适之先生为其先导。”^②正是在新旧两派的共同推动下，“整理国故”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如日中天，^③这自然会极大地带动传统文学的研究。无独有偶，1923年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小说月报》特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这可以说从根本上为“整理国故”运动扩展至传统文学领域正了名。在此种社会思潮影响的推动下，传统文学迅速摆脱了“五四”以后整体负面化的阴霾，走上了复兴之路。

胡适等文学革命派提倡“整理国故”目的是为了阻止“国故”的复活，用科学方法清算旧传统中的糟粕，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此种研究虽起到了“打鬼”的作用——挖掘出了“国故”中的“糟粕”，但也同时展现出了其“国粹”的一面。既然“国故”中确有“国粹”，这就在客观上肯定了传统文学的价值，或者说为其正了名，从而走到了其“整理国故”初衷的反面。新旧派“整理国故”的出发点虽然不同，最终却殊途同归，共同促进了传统文学的复兴。传统文学的正面价值也即“新”的地位既被确立，那么其参与新文学建设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二、谁是新潮：新旧的话语之争与异调的“文学革命”

1915年，陈独秀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称欧洲文艺思想在19世纪末因科学之兴，已由此前的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④反观中国，“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他因而认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⑤两年后他与胡适发起文学革命，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借以实现此种目标的就是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如前所述，经过“一战”欧美对物质文明产生了怀疑，并因此波及到建立于其上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各种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得以纷纷兴起。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化反思还促成了欧美“向东望”的文化趋向，使中国传统成为其新文学思潮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有益参照。如蔡元培所言，“欧洲新派的诗人，崇拜李白及其他中国诗人，欧洲的新派图画家，如Impressionism, Expressionism等，均自称深受中国画的影响，更数见不鲜了”。^⑥这种“向东望”的西学新潮反流中国，不仅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复兴，更为时下中国反思“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契机，并由此形成了诸多文学变革的新趋向。由于这些文学变革多主张中西融合，这在文学革命派者看来无疑是复古与倒退，而他们却认为自己才是新潮的真正代表者，二者的新旧话语之争由此展开。

① 梁启超：《〈改造〉发刊词》，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198页。

② 朱谦之：《新旧之相反相成（续）》，《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21日。

③ 刘敬圻：《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365页。

④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⑤ “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⑥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1—52页。

1921年，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旧学者与古文家，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未免使人失望。”^①胡适所说反对他的留学生主要指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也即次年《学衡》创刊的核心成员。胡适之所以失望于反对他的留学生，关键是觉得他们与在北京反对他的“旧学者与古文家”一样，都是复古论者，这一判断显然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学衡派反对文学革命依据的都是西方理论——主要是新人文主义，可谓是以西制西。实际上，新人文主义的兴起也是西方反思物质文明泛滥的产物。因此其代表人物白璧德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已开始的新旧之争，正在步西人故辙，并称虽理解中国进步派“有主张完全抛弃中国古昔之经籍，而趋向欧西极端卢骚派之作者，如易卜生、士敦堡、萧伯纳之流”，但“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儿倾弃之”。一言以蔽之，中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但“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最后，白璧德还特别指出“今日人文主义与功利及感情主义，正将决最后之胜负，中国及欧西之教育固同一休戚”。^②由此可见，文学革命倡导者所极力鼓吹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在西方反思物质文明思潮的冲击下，已成明日黄花，而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却成了西方的新思潮。所以学衡派批驳文学革命派的观点，是以西方之新攻西方之旧，无须像“旧学者与古文家”那样，引经据典，说一些“古已有之”的昏话。

1920年胡先骕发表《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一文，该文有鉴于中国自1918年以来新潮汹涌，写实主义文学风行于世，为青年所崇奉，遂深入分析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在西方风靡数十年的远近因，然后说至19世纪末，“科学万能之理想渐衰”，“文学界亦渐觉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可厌，而复趋于浪漫主义之一途，盖亦物极必反之理也”。^③指责文学革命派的观点陈旧、错误或过时，几乎成为具有留学经历的学衡派成员的共同趋向。如文学革命派的重要理论支撑进化论，梅光迪即称西国名家多斥其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稍读西洋文学史绪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④不知梅氏是否注意到，进化论适足为文学革命派自陷之矛，即使进化论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那么以此为依据，文学革命派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文学也已成明日黄花，没有再坚持的必要了。吴宓说得更为直白，他称写实派与自然主义“脱胎于浪漫派”，“而每下愈况，在今日已成陈迹”，“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转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餍我国之人”，“又何新之足云哉！”^⑤就实际情况而言，学衡派对文学革命派的批驳不仅时间跨度长，而且发表的文章也十分丰富，对于文学革命派的观点几乎事无巨细，均有分析辩驳，而最理直气壮的正是自己代表西方之新潮，而文学革命派则属过时之观点。1936年，胡先骕就曾不无自豪地说，“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⑥胡氏以“继往开来”自居，其意不言自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派在倡导文学革命之初，苦于旧派无人应战，其观点不彰，钱玄同与刘半农遂自导自演了一出双簧戏，而对于学衡派的缠斗，却甚少正面进行针锋相对的学理论争。胡适曾暗示学衡派的攻击源于他们留学期间的宿怨，称“《学衡》在冰桶里搁置了好几年，迟至一九二二年方才出来”，^⑦而此时新文化运动已过了讨论期，^⑧似乎无须再费口舌了。学界受此影响，从而认为二者主要是以往新旧之争的延续。这显然有悖事实，通过学衡派的文章可知他们与文学革命派是西学不同的主义之争——确切地说是新旧之争，朴学方面则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对抗。^⑨

① 胡适著，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

② 白璧德：《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胡先骕译，《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③ 胡先骕：《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5号，1920年8月1日。

④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⑤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⑥ 胡先骕著，熊盛元、胡启鹏主编：《胡先骕诗文集》下，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557页。

⑦ Q. V. (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晨报副镌》1922年4月27日。

⑧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3页。

⑨ 胡先骕著，熊盛元、胡启鹏主编：《胡先骕诗文集》下，第558页。

罗志田判断在“西方”分裂语境下中西学战已转化为中西名义下的西与西战，^①并引学衡派与文学革命派的论争为例，无疑是正确的。罗氏所谓“西方”的分裂主要指欧战后西方因自身文化反思所导致的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认识的分化与演变，这个“西方”已是含有中西融合趋向的新的“西方”，而非以单纯西学为取向的旧“西方”。文学革命派既已由新变旧，自然也就失去了话语竞争的优势。大概也正因此，相较当初与林纾的论战，文学革命派与学衡派的论争可谓出现了攻守易势。面对学衡派咄咄逼人的攻势，成为活靶子的胡适选择了正面避让，这或许如罗志田所说他已意识到了自己的“过时”，^②清楚这和以往与“旧学者与古文家”的论争不是一回事，因此只能含糊地说其源于宿怨，从而避免正面交锋落于下风。其同道钱玄同、周作人等，不明于此，觉得胡适忠厚畏缩，错失大好机会。钱玄同自知学力有所不逮，只能致信胡适，敦促他能像参与科玄论战一样，再次充当“思想界底医生”，^③胡适复信称这非几篇小品文字所能医，仍须尽量输入科学与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④不过，文学革命派对学衡派虽然缺乏正面回应的文章，但有针对性的批评文字仍复不少，但大都是基于学衡派倡导国粹一点将其贴上“保守复古”的标签，诚如有论者所说充满着对学衡派的“想象性认知和有意塑造”，对此不仅学衡派不能接受，即使是胡适也觉有错打板子的嫌疑。^⑤

学衡派接受的是欧美最新的思潮尤其是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文学观追求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也即“形式与表现的完美联合”。^⑥学衡派采纳的即是此种文学观，其代表便是吴宓提出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⑦这一表述虽与晚清时期梁启超倡导的“以新意境入旧风格”十分相似，但并非后者的直接继承。梁氏的文学变革经文学革命派的声讨抨击，已失去号召力，学衡派重拾这一过时的文学革新策略，无异于自断前途，事实上学衡派成员大都反对甚或直接批评梁氏的此种观点。学衡派的所谓“新材料”与梁氏并无本质区别，但“旧格律”主要指传统文学的体裁与写法，尤其反对梁氏所特别强调的“新词语”。当然，即便学衡派暗自袭用了梁氏的观点，此时因新旧易位，也已占据了话语的优势，属于借鉴西方最新思潮的文学变革，借用桑兵的话说，堪称文学革命的异调。^⑧不过，学衡派的文学观尽管与新人文主义一样追求“形式与表现的完美联合”，但并未创作出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作品，这正是其理论虽然较文学革命派更新更完善，却无法撼动后者地位的根本原因。

继学衡派之后以反对文学革命著名的是甲寅派，其代表人物是章士钊。章氏是留英学生，他同样对“一战”后欧洲的思想新潮了如指掌。1919年，章氏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新旧调和的观点，并称此“由经验比较而来”，这个经验就是欧洲大战后的文化反思，他认为欧洲经此一战，应“一面开新，必当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⑨与学衡派一样，章氏也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新潮，如他说“六年前之国语文学，承文体久弊之后，弥有新意。今率全国而为不学争名之事，开卷恶俗，浑不可耐，遂不期而有文艺复古之思。此之复古，乃是新机，与意大利之利乃诵斯（引者按：Renaissance音译）正同。适之譬愚‘守旧’，不知己乃化为沉痾莫救之新守旧党而不自觉”。^⑩颇具吊诡意味的是，最爱用文艺复兴一词的是胡适，他自始至终称自己发动的文学革命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未曾想竟为对手用来反击自己。有鉴于此，1927年鲁迅对文艺复兴的意义作了重新释读，说“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

① 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②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③ 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7页。

④ 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24—1125页。

⑤ 瞿骏认为胡适有将学衡派定性为“过时西学”的潜在意图。参见瞿骏：《释读吴宓的“学衡”之外——以〈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为中心》，《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

⑥ 白璧德：《新拉奥孔：论艺术的混淆》，郝二涛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33页。

⑦ 余生（吴宓）：《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3期，1929年6月3日。

⑧ 桑兵：《〈学衡〉与“新文化派”的缠斗》，《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⑨ 《新时代之青年——章行严君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15日。

⑩ 孤桐（章士钊）：《说榘》，《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1925年8月29日。

不是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①鲁迅虽然指责顽固派复活了古时“坏的东西”，但也间接肯定了复古的合理性，即古时还有“好的东西”，这就暗示出面对“五四”后新旧易位的挑战，文学革命派也不得不调整策略，化旧为新进行自身的重整与再造。甲寅派文学变革理念与学衡派大体一致，与后者不同的是，甲寅派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古文创新上，特别是章士钊，将西方的逻辑学融入古文创作，拓展与增强了古文的表现力，改变了古文不宜说理的旧训。

除学衡派、甲寅派外，“五四”后与文学革命派异趋且具有一定对立性质的新文学流派还有国家主义文学。文学革命派的文学革新目标是“全盘西化”，所以基本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虽然因为现实需要，他们也一定程度上认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但为避免由此导致文学革命走向衰退与复古，因此甚少予以公开宣扬。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语源相同，都是英文nationalism的译名，鉴于此前欧洲国家主义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此期的国家主义派特别强调自己的世界性与和平性，因此以新国家主义自居，在文化观念上诚如陈启天所说，“新国家主义在认一国之历史与文化有其优点亦有其弱点。优点则滋养之，弱点则改正之。改正与滋养之所资，不妨酌采外国之文化益求发皇精进”。也正因此，陈氏称“新国家主义者守旧党，非顽固派，非国粹家”，其目标“在求全国国民再造中国文明”，其责任“不重在过去之保存，而重在将来之创造”。^②这种观念影响于文学，首先是促进了旧文学的研究与利用。胡云翼即称国家主义者“研究旧文学的目标，却是竖着‘研究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旗帜”，如此则“研究旧文学，不但无妨于文学，并且对于新文学还有许多贡献，可以作研究现代文学，创造现代文学的资料”。^③其次，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国家主义者认为“语言之统一大有助于国民精神之凝聚”，^④因此大力倡导国语运动。与学衡派、甲寅派不同，国家主义者尽管反对国语运动中“打倒汉字”的极端做法，但并不固守成规，而是认同“使国民有一共同可用的语言”，同时承认方言存在的合理性，以此建设“相对的”言文一致的国语文学。^⑤对于文言文，国家主义者既不刻意强调，也不极力反对。再次，重申了文学的现实主义趋向。刘大杰《国家主义文学论》明确指出：“现在中国需要的文学，是国家主义的文学。这种文学，形式是写实的，内容是国家主义的。”^⑥所谓的内容上的国家主义，就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⑦倡导爱国思潮，^⑧反对颓废的个人主义，最终求得与世界文学的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民族性上发展国家文学，“以求世界文学的现实”。^⑨最后，是中西融合的文学取向。国家主义者与学衡派、甲寅派不同，他们的文学革新取向重精神而不重形式，对文言与旧格律并无执念，因此能够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学的精髓与长处，融会中西，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远较前者为大。其代表人物即为闻一多，留学之前就颇受传统文化复兴的影响，在美国留学期间因受外国人歧视刺激又接受了国家主义思想，^⑩因此对“全盘西化”的文学革命并不认同。以新诗为例，他以为新诗的“新”，不仅要“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还要“新于西方固有的诗”，也即“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⑪正是因为不执念于中西诗歌之形，而重其神，才使得闻氏的新诗创作既独具艺术风格又成就非凡，从而成为现代新诗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归国后，闻氏又加入新月社，促成了新月诗派的形成，更扩大了其诗歌创作理念的接受与传播，由于其创作要求“新格式与新音节”，故又有格律诗派之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学革命派主将之一的胡适虽不是新月诗派的直接参与者，但却是该诗派的灵魂人物，且对该诗派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说明新旧易位与传统的

① 《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228页。

② 陈启天：《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少年中国学会编：《国家主义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第41页。

③ 胡云翼：《我们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学》，《醒狮·文艺特刊》第101号，1926年9月12日。

④ 家菊：《那是国语？》，《醒狮》第66号，1926年1月9日。

⑤ 家菊：《国语运动与打倒汉字》，《醒狮》第66号，1926年1月9日。

⑥ 刘大杰：《国家主义文学论》，《醒狮·文艺特刊》第92号，1926年7月18日。

⑦ 刘大杰：《文学与国家》，《醒狮》第120期，1927年2月12日。

⑧ 树人：《文学与国家的命运》，《醒狮》第152—157期合刊，1927年10月10日。

⑨ 胡云翼：《国家主义与新文艺》，《醒狮》第59号，1925年11月21日。

⑩ 彭基相：《巴黎通信》，《时事新报·青光》1927年9月7日。

⑪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6月10日。

反流，不仅能促成带有复古色彩的学衡派、甲寅派的产生，也能对新月诗派这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流派的产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也就间接地否定了文学革命派对其负面效应的指控与批判。

以上所述虽不能反映“五四”后新旧易位情况下文学变革的整体面貌，但大体已具。受文学革命派观点影响，它们大多被认为是文学潮流的倒退或复古，而实际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它们同样是文学新潮的引领者，其推动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贡献之所以参差不齐，关键在于各自所采取的文学革新策略不同，并非其文学革新的方向存在问题，闻一多乃至新月诗派创作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这些文学变革趋向本质上不过是文学革命的一种异调——最终其实是殊途同归，不应与固守传统的守旧派完全等同看待。

三、化旧为新与新旧融合：文学革命的重整与再造

文学革命发生之初，由于占据“新”的话语优势，其倡导者皆以真理在我自居，放言肆论，不容反对者置喙。如陈独秀致胡适信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①这在文学革命派“新”的话语优势还未丧失之前，自然是可以勉强坚持的，而一旦新旧易位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可，就难以维持了。杜威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趋新派“喜为不负责任的言论”。^②在此情形下，文学革命派内部也逐渐出现了分化。

最早对文学革命极端观点表示异议的是蔡元培，他尽管不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但却是其重要的支持者与保护者。蔡氏曾在欧战期间留学欧洲，对欧战有着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因此并未像文学革命派那样极端反传统，而是认为应“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③这自然也影响到了他的文学观，1919年其所撰《自传》中说：“子弟对于应用文，极端赞成用国语。对于美术文，则以为新旧体均有美学上价值。”^④同年，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宴的演说词中，他更是声称“东西文明要媒合”，而“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⑤这正是稍后胡适倡导“整理国故”的要义之所在。

蔡元培的观点始初在文学革命派中并未形成共识，为防止传统文化的死灰复燃，影响文学革命的顺利进行，他们反而率先为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制定了规则与方法。胡适的学生毛子水首先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他使用“国故”一词，就是要否定传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新价值，因此研究它的目的，“第一须把古人自己的意思理会清楚，然后再放出我们自己的眼光，是是非非，评论个透彻，就算完事了”。^⑥毛氏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反对派的回击，张焯从“今之论学者，莫不分东西洋文明为二，且谓将来世界之文明，必为二者配合而产生者”的新思潮出发，认为“今日东西洋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今日之所谓欧化者，若不更求进步，而但自画于此，吾恐其亦将为陈死人，与国故正等”，因此“收拾国故与输入欧化”，“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⑦与以往不同的是，张焯尽管有保存国粹之意，但已换位居于新潮，因此与毛氏的论战并不处于下风。有鉴于此，胡适不得不亲自出面予以回应，他主要不满于张焯认为国故整理能“应时势之需”，世界学术界亦可“得着一点益处”，而主张“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⑧稍后胡适又撰《新思潮的意义》，重申了整理国故的态度、方法与目的，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⑨一言以蔽之，就是国粹的还其

①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② 《试验主义》（杜威在锡演讲），沈同等笔述，《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7月16日。

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页。

④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33页。

⑤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50页。

⑥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1日。

⑦ 张焯：《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第3期，1919年5月20日。

⑧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未附胡适致毛子水信摘录），《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⑨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为国粹，糟粕的还其为糟粕。这种态度看似顺理成章，却隐含着一种摧毁文学革命根基的危险。吴稚晖就说：“胡先生的大纲，杂有一部分浇块磊的话头，虽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险，容易发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①这就是说，文学革命派的“整理国故”目的尽管是为了扫清传统文化的阻碍，未曾想却促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走向了他们期望的反面。事实上，对于“整理国故”，无论文学革命派怎样做，都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即只要整理或研究出传统文化中确有好东西，那也就意味着这种“国粹”必然会参与到当下的新文学建设中去。胡适并非不明此点，而甘冒同道指责与反对于不顾，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为避免引发吴稚晖所说的那种流弊，他始终没有提倡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建设结合起来，却反复强调整理研究仅止于“为真理而求真理”，但实际上却暗自做着类似的工作。以戏剧改良为例，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之初，明确提倡师法西方的写实主义戏剧，认为中国旧剧改良应废唱废武，对于那些虚写法的“遗形物”，如脸谱、台步、马鞭子等，也应统统扫除。^②但是1920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致信胡适，称自己很喜爱中国旧艺术，希望胡适能将中西艺术的优长结合，避免短处，创造“新的真文艺”。胡适回信则称：“这真是我们一班同志的志愿。但我们的能力太薄弱，恐怕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③此后余上沅、闻一多等倡导的“国剧运动”兴起，胡适亦参与其中，且经常去戏院看梅兰芳演戏。梅氏应邀赴美访问演出，胡适更是极力促成其事，还亲自用英文撰写《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在美发表宣传，其中对他此前批评的旧剧的象征与程式化表演手法——虚写法的“遗形物”，给予了充分肯定。^④这些做法使当年胡适提倡写实主义戏剧的反对者张厚载（繆子）都敏锐地感觉到其对旧戏态度的转变，而有新旧戏调和的倾向。^⑤

实际上，像胡适这样暗中对此前文学革命观点进行调整的并非他一人，文学革命派人物几乎无不如此，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不过他们与胡适一样都担心这会给旧派以口实，从而导致复古浪潮的回归，因此对于胡适的做法，他们并不完全认同，有些甚至予以冷嘲热讽或干脆进行公开批评。鲁迅就曾说：“先前欣赏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⑥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文学革命派在新旧易位的形势下，对文学革命进行重整与再造，因为他们清楚不如此必被历史的大潮所淘汰。无独有偶，在文学革命激进的风头刚一过去，继承其精神的文学研究会便不再像前者那样遮遮掩掩，勇敢地跨出了承认旧文学有建设新文学价值的关键性一步。1921年，文学研究会发布的《改革宣言》明确指出西方文学的输入与中国文学的整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必要性，同时称他们“深信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现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因此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⑦这显然已突破了以往文学革命派否认与阻止“国故”参与新文学建设的可能与底线。1923年，文学研究会又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特意开设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以期引起国内舆论的注意与讨论。郑振铎发表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文，直接声明“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⑧余祥森甚至称“旧文学底实质，和新文学底实际是一样的”，因此“新文学的基础，不当单建在外国旧文学上面，也不当单建在国故上面，须当建在外国旧文学和国故的混合物上面”，并说“这样的新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新文学”。^⑨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会不仅反对旧派整理与研究国故的方法，对于文学革命派的做法也不满意，称其“喜引欧美的言论以相附会”。^⑩言外之意就是他们

①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亚东图书馆编：《科学与人生观》，第7页。

②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

③ 耿云志：《胡适与青木正儿来往书信二十七通（三）》，《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④ 肖迪、封杰编：《梅兰芳纪念集壹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4页。

⑤ 繆子：《新文学家与旧戏》，《北洋画报》第7期，1926年7月28日。

⑥ 《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⑦ 《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⑧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

⑨ 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

⑩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

虽然倡导科学的整理与研究法，实际上不过是借此为文学革命铺路，扫清传统文化的阻碍而已。

文学研究会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与方法，既不同于文学革命派，也与旧派或学衡派有别，由于其文学革新趋向与文学革命派一脉相承，因此他们倡导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结合起来，同样需要先化旧为新，不过相对而言已明显趋于理性。在文学研究会中，周作人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存在，他是文学革命派的老人，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创作方面都影响巨大，他的转变最能说明“五四”后文学革命重整与再造的延续性趋向。周氏在文学革命发生之初，对旧文化也即国粹的排斥与批判态度远较胡适激烈，而接近于乃兄鲁迅。但自加入文学研究会后，其态度明显发生了改变。1921年，周氏发表《个性的文学》，其中称“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①对于国粹，此前的文学革命派是极力排斥，似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揆诸事实，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周氏终于现实地承认了这一点。跨出这一心理防线，走向新旧或者说中西融合的新文学发展之路，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次年周氏对国粹与欧化问题重新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思考，最终认为“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面不可”。^②周氏由此指出新文学里也“常有似乎复古的现象”，但称这“决不是复古”，而“是一种革新——对于现在的反抗运动”，并强调“形似复古的新文艺绝没有保存国粹的气味，他不是义务的去为古文化服务，只是趣味的去赏玩去利用他”。^③至于如何化旧为新也即通过旧文学的研究来为新文学服务，周氏的观点是不必太着意于外在的形式，研究古文学就是“查考前人的经验”，^④为当下的新文学创作提供参考与借鉴。基于此种认识的转变，周氏对文学革命派的极端观点作了全面的反思，提出了重整与再造文学革命的新思路。如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他称“只就艺术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制定谁是谁非”，并认为要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就应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⑤最关键的是周氏对“死文学”“活文学”的重新认识，他称古文、白话文都有死活之分，“死文学活文学的区别，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方便不方便”。^⑥职是之故，他认为理想的国语，应“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⑦在文学的内在精神方面，周氏认为应挖掘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相通的因素。如明末小品文，这是周氏最喜爱也是倾心最多的一个古文学领域，他曾反复称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⑧有时甚至说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⑨存在这种认识不难理解，周氏基于自身阅读体验，发现“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⑩反礼教的思想也与他倡导的“个性的文学”存在相通之处。当然周氏对于现代散文生成的判断与认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放弃了“文学革命”这一通行的称谓，而认为应用“文艺复兴”才更为合适，这一态度的转变是颇值得玩味的。后者的意思诚如鲁迅所说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这就表明周氏更加强调了旧文学在新文学建构中的作用。很显然，周氏对文学革命的重整与再造，越来越接近前文所述的异调的“文学革命”——尤其是新月诗派。另外，他关于戏剧改良的重新思考，即《中国戏剧的三条路》中所提出的戏剧改良方案，如新旧剧“分道扬镳”、旧剧改良及新旧剧调和等，^⑪也与被时人称为具有复古倾向的“国剧运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① 仲密：《个性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

② 仲密：《自己的园地·国粹与欧化》，《晨报副镌》1922年2月12日。

③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4页。

④ 仲密：《自己的园地·古文学》，《晨报副镌》1922年3月5日。

⑤ 仲密：《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晨报副镌》1922年2月19日。

⑥ 周作人：《死文学活文学》，《大公报》1927年4月15—16日。

⑦ 周作人：《理想的国语》，《京报·国语周刊》第13期，1925年9月6日。

⑧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⑨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2页。

⑩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832页。

⑪ 周作人：《中国戏剧的三条路》，《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15日。

除文学研究会外，“五四”后自认为继承新文化运动精神的重要文学社团还有创造社，二者堪称后期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双子星座。不过，二者在文学观念上存在明显分歧。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创造社并不赞同极端的反传统，尤其是将“中华民族的堕落全归咎于孔子”的观点，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他们毫不避讳公开表示“崇拜孔子”。^①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创造社的思想保守，恰恰相反，在接受域外文学潮流方面，创造社甚至比文学研究会更为新锐，在传统文化的化旧为新方面自然也不会落后。创造社成员对其时国故整理的各派别，均不满意，成仿吾就说其时无论中外的新旧学者，对传统文化精神与思想“误解得已不成话”，“旧的先入之见太深，新的亦鲜能捉到真义，而一般假新学家方且强不知以为知”。批评新派的国故整理“鲜能捉到真义”，是颇值得玩味的一句话，成氏的本意实际是指新派国故整理的新义不足。所以他接着说：“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的，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②所谓“常新的境地”显然是指能与现实的新文化建设内在相通。作为创造社的灵魂人物也是其中传统文化研究成就最突出的郭沫若，就不止一次公开宣称应该把中国的传统精神恢复，尤其是“从事文艺的人”，更“应该极力唤醒固有的精神，以与国外的世界主义者相呼应”。^③那么，如何恢复传统精神呢？这就“要研究古代的宝藏，收集古代的遗物，期以辟往而开来”。^④很显然，与文学研究会相比，创造社更加强调了国故整理与新文学建构之间的联系。

无独有偶，1923年郑伯奇发表了长篇论文《国民文学论》，该文即是在成仿吾鼓励与催促下完成的，文中提出了“国民文学”的革新方向，明确阐明了“国民文学”与国学运动之间的关系。其中称“国民文学决不是国学运动的分体，但是它有待于后者的地方”，因为“一国民也如一个人一般是个生命的持续体。生命之流是前波注入后波的”。这即是说国民文学有其继承性，因此通过传统文化的研究，既可在形式方面为新文学提供帮助，如“使白话文的语汇丰富”等，也可在精神方面，如先民的传说、神话、历史人物、风俗习惯等，给予新文学以滋养。因此郑氏认为他“不仅不反对国学运动”，而且“很希望国学运动在正当的路径为很圆满的发达”，这样就可以与国民文学家进行十分有益的合作。^⑤正如郑氏事后坦承的那样，“国民文学”在启念上受到了时代民族解放风潮乃至国家主义的影响，^⑥其同道穆木天也曾以“National Literature”来指称它，但与后者相比，“国民文学”更注重个性主义的文学而非凝聚民族精神的国家。^⑦或许是担心由此导致复古的回潮，郭沫若、成仿吾对“国民文学”未置可否，而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则十分赞同，予以积极响应。二人都阐明了“国民文学”与复古式的国家主义文学的区别，^⑧称“欧化”与“国民化”是互助共进的关系。^⑨

正如创造社攻击文学革命派等新派落后与复古一样，其“国民文学”观也遭到了对手同样的回击。钱玄同将其与倡导排外、唱论“爱国”的文学同等看待，称其为“‘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主义”^⑩的复活。类似于钱氏这样严肃批评的声音还有不少，不过细致分析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没有认真阅读或者说理解“国民文学”的真正含义，批评流于意气，一如当年创造社对于胡适等新派的批评。所以看清“国民文学”实质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周作人，在对待“国民文学”的态度上就相当温和，指出其“不过是民族主义思想之意识地发现到文学上来罢了”，因而认可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但称“提倡国民文学必须提倡个性主义”，同时还要防止由此导致“非古文不做，非古诗不诤”的复古趋向。^⑪

①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② 成仿吾：《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附识，《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③ 郭沫若：《国家的与超国家的》，《创造周报》第24号，1923年10月20日。

④ 郭沫若：《中华全国艺术协会宣言》，《创造周报》第22号，1923年10月7日。

⑤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

⑥ 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31页。

⑦ 穆木天：《寄启明》，《语丝》第34期，1925年7月6日。

⑧ 王独清：《论国民文学书》，《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⑨ 穆木天：《寄启明》，《语丝》第34期，1925年7月6日。

⑩ 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30日。

⑪ 周作人：《答木天》，《语丝》第34期，1925年7月6日。

对于钱、周等人的批评，郑伯奇、穆木天、王独清等均作了回应，解释的内容与周氏的理解基本相同。有学者对双方论争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他们的“文学观念并无本质冲突”。^①这一判断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这恰恰说明“五四”后文学革命派在新旧易位这一新文化环境下所进行的自我重整与再造，尽管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但路径与方法基本都是化旧为新与新旧融合，可谓是殊途而同归。

要而言之，在新旧易位这一新的文学生态影响下，“五四”后约十年间的文学可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独特的存在，即无论新旧各派都自认为居于“新”的优势地位，而批评对方为旧。这种相互之间的批评与指责，很大程度上是无的放矢，即都担心对方走向倒退或复古，而在缺乏彼此之间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进行无谓的意气之争。不过这种互动也并非毫无意义，它避免了任何一方企图趋于极端也即中或西的文学变革之路，而默契地达成了中西融合的潜在共识。尽管各方对中西融合的理解与实践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基于现实需要且参照西方最新思潮而进行的中国化文学道路的探索与试验，共同构成了此期文学变革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因此对其评价不应基于后见之明，予以人为褒贬。这些众声喧哗的文学变革趋向，因各自采取的文学革新策略不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也迥然有别。就实际情况而言，注重中西文学精神的融合，而非着迹于形式，这种文学变革具有更强的生发性与创造力，因而也更容易取得突破性的文学成就。理清这一过程，无论是对于全面反思“五四”文学革命的成败得失，还是重新发现与评价“五四”以后其他文学变革趋向来说，均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其意义还在于“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成立的标志与典范，对其历史认识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此后的文学研究乃至今天的文学创新与文化重建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的“新”“旧”问题尤其如此，从本质上讲，“新”“旧”只是表象，背后关涉的是中西如何调和取舍的问题，事实表明中西既不能偏废，亦不可着迹于形式，这样才能促成二者的有机融合，为中国文学走自主化的创新之路提供持续而强大的动力。

(责任编辑：李亦婷)

Shift of the Old and New: Reorg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JIANG Ronggang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goal of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which led to a comprehensive negation and criticis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However, within less than two years, a cultural trend emerged in the West—prompted by reflections on World War I—that “looked toward the East”, praising and learning from Eastern cultures (mainl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trend flowed back into China, resulting in a shif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not only reshapes the positive im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s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but also gives birth to many literary reform trends such as the Xueheng School, Jiayin School, and Nationalist Literature that consider themselves new trends or can be called “literary revolution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original advocates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and their successors, including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the Creation Society—were compelled to reorganize and reconstruct their initial revolutionary ideas in response to opposition and to adapt to new realities. The process of restoring history has important academic reference value, whether for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n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other literary reform trends, or for today's literary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A Shift of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Literary Revolution; Abnormal Tone; Reconstruction

^① 董炳月：《1923—1925：“国民文学”的倡导与论争》，《文艺研究》2019年第11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重点项目资助期刊

2026/04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主管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社会科学》编辑部
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盛垒（主持工作）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顺昌路622号3楼
邮编：200025
电话：021-53062234
021-63841642
印刷单位：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
国内总发行：上海市邮政公司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112/Z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0257-5833
国内邮发代号：4-273
国外发行代号：M256
出版日期：每月25日（月刊）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购零售处：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
定价：50.00元

